

18069

政變論

王聖寶 著

中華書局

WKS 1/14

僅以此書

獻給敬愛的終生奉獻的母親田玉英

目 錄

第一章	序論：不肯離去的恐怖幽靈	1
	冷落的一角	1
	政變者的自我粉飾	6
	失靈的政變防範術	9
	應由局外人來做這門學問	12
	側重採摘中國史料	14
第二章	不同的政變類型	17
	權臣專權	17
	垂簾聽政	21

奪嫡之變·····	25
宦官干政·····	32
兵變·····	38
諸侯叛亂·····	41
禪讓·····	44
隨機而變·····	49
長期潛謀·····	51
國際顛覆·····	56
第三章 政變的特點·····	63
繼統時節「變」紛紛·····	63
近衛軍發難多成功·····	67
難逃腹心謀篡關·····	71
一條通則：弑君·····	74
多行不義必自斃·····	86
變法改革易招政變·····	90

快頻率	96
專制必變律	99
反叛的旗號：清君側	100
父愛移，太子廢	103
用「太上皇」遮醜	108
裝病蟄伏瞞天過海	113
弑君方式毒殺多	115
第四章 多樣性的政變世界	120
進步性政變：呂后篡漢又安漢	121
革命性政變：「光榮革命」	127
反動政變	137
中性政變	141
第五章 統治者的工具	145
變更政體	145

改朝換代·····	153
更立制度·····	163
第六章 政變爲什麼發生·····	172
經濟要求權力保護·····	173
政治腐敗不可逆·····	182
拉社會向後看的統治思想·····	190
不穩的脆性權力結構·····	196
異己權力的增長·····	209
自私的人慾·····	215
後記·····	221

第一章 序論：不肯離去的恐怖幽靈

政變就像一個恐怖的幽靈游蕩在世界各國政治舞台上，怎麼也不肯離去。政變又如一隻兇猛的餓虎，窺伏伺機，隨時撲向獵物，不知多少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成其口中物、腹中食。而且，古今中外，王國不斷滅亡，朝代不停更替，但政變卻千古常在。比較而言，土崩之勢難成，政變之局易就。雖土崩之時，小民皆為敵國，實可憂，然百年難遇；而政變則不期而至，防不勝防，又多血濺丹墀，頃刻覆亡，因而更可懼。所以，統治者怵怵於心者，政變也。

冷落的一角

可是，政變雖鬧得統治者坐臥不寧，直接影響着治國方略、大政方針的實施與推行，因此也影響着社會與歷史的進退，成為不可等閒視之的歷史與現實的社會現象，但

卻受到冷落，缺乏應有的重視和研究。且看本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在政變方面的研究是何等的淒涼寂寞！《七十六年史學書目》收集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七五年間的中國學人著譯的史學著作九千餘種，書目共分二十類，然而，獨不見政變一目，也不見論述政變的一文一著，近十餘年，有關政變研究，依舊寥寥，只見一兩篇論述某次具體政變的文章，而作為總體的、系統的、通論性的著述，尚未面世。《一九〇〇年——一九八〇八十年來史學書目》問世，新增條目三千七百七十四條，上下編共分二十六類，仍不見政變條目。尤其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於政變，聞者色變，論者怯步，連黎民百姓也不敢把政變問題當作飯後茶餘的談資。事實上，政變成了研究領域的一大禁區，十年之後，餘悸猶在，雖有奮勇者，但對於政變的研究，仍然受到種種阻力。

如果說特殊的政治氣候，禁錮了近百年中國學術界對於政變的研究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對於世界各地學術界不甚重視政變研究而幾乎沉寂了數千年的狀況，就頗費思議了。事實上，從學術角度研究政變，外國很早就開始，成果較豐者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實了他開創的政治學內容，深入了他的《政治學》教本。亞里士多德所處的時代，正值古希臘城邦國家危機重重，走向衰亡沒落之際。他目睹了這一現實，並看到了政變頻仍是危機加深和矛盾激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亞里士多德不僅從一百五十八個希臘城邦的比較中，研究了城邦國家的一系列問題，諸如國家的起源、

目的、任務和性質，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體等，提出了關於國家的一般理論，而且，着重討論了政變問題，比較研究了雅典、斯巴達等幾個主要城邦國家的政變，敘述了政變概況，探討了政變原因，提出了防範政變措施。可以說，亞里士多德朝着總體和系統方向研究政變問題邁出了第一步，而且，後世學人在這方面獲得成果未出其右者。但是，由於人類剛剛步入私有制社會，由於希臘城邦國家的固有特點，致使政變的廬山真面目還若隱若現在雲霧之中，從而限制了亞里士多德觀察的視野，也限制了對政變規律性的探討，尤其他無法看到後世二千多年的異彩紛呈的政變，因此，他關於政變研究的總體把握不夠全面，缺乏應有的廣度和深度，諸多論點得不到充足論據的支持而顯得蒼白。

自亞里士多德之後，有關政變的論述，散見於阿奎那的《論君主政治》、馬基雅維里的《君王論》（舊譯《君主論》，又譯《霸術》）和《佛羅倫薩史》、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羅馬盛衰原因論》、《社會契約論》、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藝》等著作裏，不過，大多浮光掠影，蜻蜓點水般一帶而過。他們在這方面並未潛心研究，所以也就沒有多少入木三分的見解。此外，還有一些就某次具體政變發表的論著，如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崙》，蒲魯東的《從十二月二日政變看社會革命》等，但也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已。

倒是古代中國貢獻了兩部涉獵政變的宏製巨著。一部是《春秋》。《春秋》是魯國

太史世代相續，逐年逐月秉筆登記的檔冊、朝報邸鈔一類的記錄，它是一部編年史，多稱中國編年史的鼻祖。可是一經孔子筆削而成了他的專著，皆云孔子作《春秋》。雖「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但備載春秋政變：「《春秋》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如此，數千之「指」中，記敘政變，其實爲其主指。孔子作《春秋》，惜墨如金，倘無傳附之，後人誰也不能領略其微言大義。爲何記敘政變卻不吝筆墨？孔子之世，禮崩樂壞，政不在天子而在諸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更甚者，諸侯政移，「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政治危機日益嚴重，其重要標誌就是政變紛起，閭閻相爭不斷發生，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政變高潮。許多諸侯在政變中身亡繼絕。同時，春秋之際各國爭霸，弱肉強食，一些國家紛紛滅亡。孔子當然不會無視嚴峻的政變現實。在他看來，政變之所以起，因三王之道廢而不明，亂臣賊子由是而作。所以，他要用《春秋》來懼亂臣賊子，遏其萌心，防止政變，達到「存亡國、繼絕世」，恢復周公之制的目的。

另一部爲司馬光奉宋英宗「論次歷代君臣事蹟」之旨命主修的《資治通鑑》。所謂「修歷代君臣事蹟」，無非是撮集歷代治國得失，尤其溶匯君臣之間篡逆僭弑和防止僭弑的「事蹟」於一爐，以爲史鑑。司馬光不辱帝命，「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且對於「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殛」。

所以書成之後，立即受到宋朝最高統治者的褒獎。宋神宗賜書名曰《資治通鑑》，因其可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或問：宋朝開國不久，為什麼統治者急於修一部《春秋》性質的書呢？這是因為隋唐五代又形成了一次政變高潮，特別是近在眼前的五代。五代時有五個小朝廷相繼登台演戲，時間最長的是梁：十七年，唐次之十四年，晉又次之：十一年，周不足十年，漢最短：不足五年。先後歷時五十四年，其間共發生政變近二十起，平均不到三年發生一次。史學家范文瀾曾分析道：「五代時武夫們除了彼此間用武力相劫奪、懷惡心相猜忌以外，很少有其他關係。統治階級也有它的階級道德，五代時，道德完全破壞，善意相維持、推誠相信任的風氣根本不存在。武夫們分裂成毫無黏性的無數碎片，組成的朝廷，壞的固然很快就消滅，偶有較好的同樣不免於被劫奪、統治階級醜惡到如此地步，社會將無法得到安定。」更何況趙氏天下本身就是靠奪人孤兒寡母之政的政變得來的，因此對政變防範得格外嚴。北宋一開國，馬上採取釋兵權、削藩鎮等措施，誰知，即使如此，政變卻在悄悄地準備。「燭影斧聲」，出奇不意，暗算了宋太祖，因此，北宋統治者為警誡「元凶宿姦」，防範政變計，才急欲修《通鑑》一書。然而，《春秋》、《通鑑》雖涉獵政變，但僅僅是記述，而非研究，因而稱不上是學術性專著。雖然如此，自《通鑑》後，中國再沒有出現一部類似「政變史」性質的史書了。

政變者的自我粉飾

什麼是政變呢？根據許多史料來理解政變的含義，當指政權的更迭或易手，以及大政方針乃至國策的改變。廣而言之，起義推翻舊政權和統治階層內部非正常的更易政權，均謂之政變。在狹義上，獨指後一種情況，亦即宮廷政變，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政變。這種狹義上的政變，除了篡弑僭逆，其他如更改前朝帶根本性的治國方針，像北宋元祐更化和紹聖熙寧之類；誅戮制定國策的執政大臣，如西漢吳王劉濞請誅晁錯，南宋楊皇后、史彌遠密謀於玉津園暗殺韓侂胄；以奪大寶為目的的諸侯叛亂，如西晉八王之亂，明初靖難之役，法國「三亨利之戰」等例；藉奴隸起義、農民起義或人民革命運動之勢而竊國者，如小亞細亞的阿里斯托尼庫斯踏着奴隸的屍骨奪取培爾伽姆王國政權。沙俄留克里王朝的一批貴族假農奴和哥薩克人起義的力量，把偽底米特里推上了沙皇寶座。隋末農民大起義風起雲湧之際，隋朝太原守將李淵乘勢起兵而得主天下。正因此，政變與人民羣衆反抗運動、起義、革命常常交織一起，難以分出一個清楚的界限，故亞里士多德常把政變與革命混為一談。諸如此類均應屬於宮廷政變的範疇。

正因為宮廷政變屬於非正常政權更迭，故自古以來便被目為不光彩不道德的行為，

以致人們羞言政變，小視政變。而且，由於政變忤了傳統道德，逆了傳統心理，違了統治階層法律，亂了帝王的繼統常規，往往招致社會輿論的非難，特別會引起統治階層內部的激烈反對，甚至會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激起反政變浪潮，導致社會動蕩，搖晃政變者奪得的政權，並且還會出現效尤者。因此，聰明的政變者總是千方百計粉飾自己。諸如：禪讓。這是一着高招，妙不可言，一下子就把劫奪的面目掩藏起來了，我們以後將涉及這個問題。又如，求助神的光環的照耀。古代埃及許多靠政變上台的法老（國王），差不多都自稱受神的指示使然。神意不可違，政權之得，天經地義，愚昧無知的國民當然也就馬上俯首稱臣了。政變者把自己說成合法的繼承人或帝王後裔，也是一帖常用藥方。古代世界各國在政權繼統問題上，出現一個共通的怪現象：不論帝王後裔怎樣同室操戈，互相殺伐，爭奪權柄，都不會引起多大的非議，而且不論其中哪一個奪得政權，都容易被社會心理承受，很少落個僭逆的罪名。如果異姓人主，則立刻受到「大逆不道」的非難，於是扼腕之士憤憤而起，興師問罪之徒隨之而來，使其政變很難成功，即便成功，其政權也不穩固。造成這一共通的怪現象，主要原因是家天下世襲的結果，同時也由於統治者的不遺餘力的宣傳，形成了傳統的社會心理所致。所以異姓政變者常常冒充帝王子孫，合法的繼承人。僞底米特里因此登上了沙皇寶座，但不久又被政變者弑奪，然而又出現了第二個僞底米特里。波拿巴是一個假拿破侖，可他正叨此

光，「路易·拿破侖勝利的全部秘密就在於，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聯的傳統才得在一個短期內保持住法國社會中相互鬥爭的階級之間的均勢」。甚至連一個釋放奴隸因其僭稱爲前保民官的兒子而被選爲公元前九九年的羅馬保民官。更有甚者，古羅馬後期的許多養子、繼子因其養父、繼父爲獨裁官或奧古斯都而平步青雲，或靠繼承上台，或靠政變奪位，多數人竟能受到承認和擁護。當然，靠軍事力量維持政權的武人當政時期，他們全憑手中的武力頻繁政變，根本不需要冒充什麼帝王後裔而把自己扮成合法的繼承人，如中國五代十國和羅馬的帝政時期便是。對於昏君暴主，政變者更容易粉墨登場，多半打着爲民除暴、代天行罰的旗號發動政變。救世安民，儼然一副救世主的姿態。如果既不昏又不暴，政變者欲奪其政，便採用散佈謠言來醜化、污損爲政者，造成一個其政該奪的假象，然後奪之也就順理成章。政變者爲了使政變合法，時常在政變後強迫法律宣佈自己合法，如古羅馬的蘇拉、凱撒、屋大維等人都是這麼幹的。

政變者爲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之態，所用掩飾方法之多，豈止上面列述的幾條，因已足夠說明問題，故不再列述。不過上面幾條，是古今中外政變者通常所採用的一般掩飾方法。政變者之所以絞盡腦汁粉飾自己以求合法性，固然爲了穩固政權的需要，而更主要地則是懾於傳統的社會習慣、道德、心理。傳統勢力是最可害的勢力，習慣的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而傳統的習慣看法，則把政變與非法、不道德、殘忍、罪惡

等聯繫在一起。形成的歷史積澱是：政變就是罪惡，是件應當受到詛咒的極不光彩的壞事。

失靈的政變防範術

政變研究，在世上是很零落的；而防止政變的研究，倒是繁花錦簇，雖十之八九為無果之花，但風景還是好看的。這是統治者悉心培育的結果。統治階層中的政治家、思想家們熱衷於政變防範術的研究，替帝王們設計出一套又一套的措施，向最高統治者開列了一帖又一帖的良方。其中有理論的、道德的、法律的、組織的、機構的，有臨時性的，也有長久形成制度的，有假仁假義的，更有兇殘狠毒的，五顏六色，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許多帝王綜合運用各種防範措施，形成近乎全方位的防範系統。以為這樣一來，便可阻塞政變者的可乘之隙。可是，事情往往與主持者的願望相反。名目繁多的防範術，花多果少。甚至，政變者正是利用了防範術發動政變，變防範術為其篡弑的護身法寶，唬人的虎皮。

帝王、統治階層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壓根兒沒想到，當他們全力以赴建立專制獨裁制度的時候，實際上是在為政變耕耘、播穀。君主專制制度像孕育野草的原野，政變在

這片原野上發芽、生長和蔓延。在這樣的制度下企圖防範政變，猶如鋤地、燒荒一樣。一有氣候，「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政變是專制制度衍生的特有產物，寄生在何具有專制獨裁性質的政體內，與專制制度同在。而統治階層畏懼政變，因此就越發強化專制制度，而越是高度集權獨裁的專制制度，政變越容易發生。這一政變的發生規律，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無論君主專制、獨裁專制或寡頭專制，也無論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共和制，或者不完善的民主共和制，也不管是哪個階級執掌政權，只要是高度集權性質的制度都會成為政變的棲身之所。翻開現代和當代的歷史畫卷，其中政變之多，直如野草一樣叢生着，而且多數發生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軍事獨裁和其他形式的專制獨裁國家。現代專制獨裁國家的政變風潮，進一步說明了古代專制帝王留下來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各樣的政變防範術，不僅失靈於當時，而且失效當今。

從歷史看，在政變防範方面頗有作為和成效的，是古代堅持民主共和制的奴隸主和近現代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更稍勝一籌。資產階級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花多大的氣力進行研究，而主要是研究如何防止君主制度的重演，如何防止獨裁政治的再現，讀一讀《聯邦黨人論文集》便可清楚看見資產階級對於君主專制制度是何等的深惡痛絕，以及勝利後的資產階級對專制制度的餘悸。而鏟除了專制、獨裁和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權制度以後，也就鏟除了政變賴以存身的土壤，起碼是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政變作祟的機會，如

美國議會制共和國就是一些「不需要害怕政變的國家」。這大概是執掌政權的資產階級始料未及的一個意外收穫。不過，這並不是說，像美國這樣一些執政的資產階級已經一勞永逸地根治了政變，因為美國資產階級執政才二百餘年，其間幾度出現政變危機，現在的總統集權趨勢又悄然滋長着；而古羅馬的共和時期，曾有四百多年基本上沒有發生明顯的政變，但後來軍事獨裁傾覆了共和政體，進入了帝國時期。羅馬一進入帝國時代，政變馬上接踵而至，就像翻跟頭一般一個緊跟一個翻完了羅馬帝國歷史。諸如美國這樣的國家能否真正徹底擺脫政變幽靈的侵襲，還要看民主勢力的消長和歷史的檢驗。

社會主義國家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理論上，無產階級較之於歷史上的其他的階級，其本質的不同就在於「無產」，因而不會形成如有產階級那樣以產業多寡為紐結的不同階層和集團，也就不容易出現維護階層和集團利益的紛爭攘奪和不斷要求權力重新分配的現象。如是，無產階級政權按理與政變無緣，似可不必顧慮內部有什麼僭位者，沒有必要考慮什麼政變防範問題。所以，一些共產黨人認為，政變「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是不應有的」。但是在實踐上，儘管無產階級政權歷史較短，但已經演過好幾幕政變鬧劇了。為什麼？至今為止，世界上由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幾乎是清一色的政黨政治，而且都是一黨專政。並且，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又是通過其領袖人物實現的。